

“话语与中央文献英译研究”专栏

主持人语（田海龙）：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不仅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而且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也很有传统，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这不仅对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丰富着一般的翻译理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新形势下，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更重要，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也日益深入和丰富。本专栏的三篇文章即是在这样一种新形势下对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

田海龙的文章从超学科的视角思考中央文献英译的范式问题，通过讨论话语研究与中央文献英译研究之间相互对话和彼此汲取对方养分，提出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可以跳出“忠实-灵活”孰优孰劣的讨论循环，从话语研究中吸取一些有用的概念、理念和框架，进而形成一个新的研究范式。这方面的思考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但是具有启发意义，可以为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在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开启一个新的路径。陈勇的文章运用再情景化的分析框架，对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进行研究，发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并不体现在对原文文本的忠实上面，而是体现在原文文本所在的语境上面，进而认为对原文进行了适度的改写，将原文演讲的语境移植到新的语境，让目的语读者能像源语的交际参与者那样感受到演讲的氛围，达到等效。这个研究对考察中央文献翻译的过程和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一个有思考的尝试。尹佳的文章也是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且分别从译者对原文意识形态的认知与解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意义商讨与选择以及译者在译文中运用的话语建构策略三个方面挖掘译者在中央文献英译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在一个方面体现出中央文献英译是一个动态过程的特征。

本专栏的三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以话语研究为理论基础，将话语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融入对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思考，因而都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当然，因为是开拓，所以有不足，希望有后续研究对此加以完善，实现新的突破。

中央文献英译的话语研究范式 ——超学科视角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摘要：中央文献英译一般被认为首要的原则是忠实原文，但灵活的翻译策略也同样有所应用。跳出这样一个“忠实-灵活”孰优孰劣的讨论循环，从超学科的视角探索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新范式，提出中央文献英译可以从话语研究中吸取一些有用的概念、理念和框架，进而形成中央文献英译的话语研究范式。

收稿日期：2017-0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与国际学术话语的交流策略研究”（14BYY070）

作者简介：田海龙，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批评话语分析、话语与翻译研究

关键词：中央文献英译；翻译研究；话语研究；新范式；超学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2017)5-0001-07

一、引言：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

首先需要界定的一个概念是中央文献。依据贾毓玲(2011)的定义,中央文献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文件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重要政策文件。由此引出第二个概念,即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不言而喻,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指将这些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翻译成外国语言的工作。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不仅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而且对它的研究也很有传统,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不仅对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丰富着一般的翻译理论研究。我们将对中央文献翻译的理论思考称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这是我们需要明确的第三个概念。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可以帮助世界了解中国,也可以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治国理政方面的有效方式和经验,为世界作出中国的贡献。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事等方面的交往更加密切,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令世界瞩目这样新的历史背景下,外国政要、媒体和民众更加渴望了解中国的发展,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也更重要和不可或缺。与此相关联,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也日益深入和丰富,产生出许多值得借鉴的观点。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首要的原则是要忠实原文(如王弄笙,2004);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新形势下用外国受众听得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也非常重要,因而在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中需要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如赵祥云,2017)。这样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似乎集中在对忠实与灵活的孰优孰劣以及为何优为何劣等问题的讨论上,使研究的视野局限于“忠实-灵活”之间,因而容易陷入一个无休止的讨论循环。

本文从话语研究的理论思想出发,从超学科的视角讨论话语研究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主要是英译)研究之间展开对话的可行性,探

索通过彼此将对方的逻辑和原理内化于自身而发展出新的中央文献英译研究范式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在致力于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过程中,学者对话语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解读更为关注,这也对形成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尤为重要。而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这一新形势也对中央文献翻译英译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话语研究与中央文献英译研究便在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形成了许多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为我们在话语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新范式提供了基础。我们将从讨论话语及话语研究开始探讨这一新的研究范式。

二、话语研究：后现代视阈下的语言学研究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术语,“话语”的使用频率在当下远远超过了“语言”这个术语。“话语”之所以成为学界的热词,一方面是由于当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这些新问题的思考所致。就前者而言,当下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而科技创新与全球化飞速发展带给社会的不仅是生活的便捷,还有调节社会契约的那些传统手段的失灵且无从翻新(克里斯蒂娃,2016:2)。这些新的社会问题促使学者的思考不再关心研究对象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样的问题,甚至不关心我们如何认识研究对象这样的问题,而是关心我们如何表述研究对象,语言如何呈现研究对象这样的问题。这些思考对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普遍认为一切有意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得到实验检验并获得确定答案的现代主义进行质疑,并且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认识到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建构作用(刘亚猛,2008),形成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的转变(高玉,2009:65)。

然而,“语言”这个术语脱离不开它现代主义的思想根基。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现代语言学将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为现代主义的发

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语言学将语言作为客体 (object) 进行研究, 观察它的各个层面, 发展出音系学、句法学、形态学、语义学等。在 20 世纪主流语言学的研究中, 语言是与语言使用者分离的一个系统, 也是与研究者无关的一个客体, 这样的语言学研究为现代主义思想和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学者更加关注社会生活中的人如何表述社会事实这样的问题时, 语言作为人们传情达意的交流工具, 其与使用者分离的特性已不能体现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因此, 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 (如福柯、德里达、布迪厄、哈贝马斯) 把研究的对象转向话语, 并提出一套关于话语的概念和理论。他们把话语提升到建构知识的首要位置, 认为知识是由话语生成的, 同时话语又通过对知识的运用来控制社会实践。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中, 话语对社会实践的控制体现出权力在知识话语建构中的重要性 (Foucault, 1972, 1984)。

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一些接受过现代语言学训练的语言学家 (如范代克、沃达克) 也把研究的重点转向话语, 并发展出话语研究的话语学范式 (田海龙, 2016a), 如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 CDA)。在批评话语分析者看来, 话语首先是语言运用, 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运用的语言, 但更重要的是与语言运用相关联的社会因素, 是人们运用语言的方式和制约人们运用这些语言方式的社会规约 (田海龙, 2009)。观察社会生活可以看到人们依据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交流目的, 依托不同的机构, 选择使用不同的词汇、句式、体裁、模式来传递信息、参与实践、构建身份、再现事实。这些社会实践构成了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话语概念 (同上: 34-35)。话语与权力及意识形态等概念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 使得话语与语言的概念产生了本质的区别。如果说语言是语言使用者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 因而与使用者可以分开, 那么, 话语和语言使用者就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话语即是语言使用者, 而语言使用者 (身份、价值取向、意图、与交流者的关系等) 便镶嵌在他使用的话语之中。换言之, 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他所依托的机构属性以及与其他交流者的关系

全部体现在他的话语之中。

广义上的福柯式话语研究以及狭义的作为话语研究语言学范式的批评话语分析在对话语概念的解读上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思想。这包括话语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意义形成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某个意义的形成是相对的, 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而且形成后也并非不可变化; 话语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所, 不同利益集团通过所掌握的话语资源和话语手段参与建构意义的社会实践, 处于主导地位的一方会利用话语维持现状, 处于非主导地位的一方也会利用话语争取主导地位。话语的这些后现代主义思想特征对翻译研究是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

三、话语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翻译研究的许多理论, 如奈达 (Eugene A. Nida) 的功能对等理论、格特 (Ernst-August Gutt) 的关联翻译理论 (杨建华, 2009) 对认识翻译的内在规律都有所帮助。也有一些理论, 如以勒菲弗尔 (Lefevere, 2004) 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理论考察意识形态、经济状况、赞助机构及其社会地位等多种来自翻译本身之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提出“翻译即是改写”的命题, 认为任何改写无论动机如何都源自某种意识形态并且用某种方式操纵翻译在某个社会中发挥作用。沿着这一思路从话语研究的视角看翻译研究, 可以发现以上讨论的一些话语研究的思想特征亦体现在对译文、译者和翻译过程的认识上面。

首先, 从话语研究的理论思想出发, 译文被认为是一部译者再创作 (许钧, 2003) 的作品, 它可以趋于完美, 但并非绝对忠实反映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这一方面是因为译者对原作者概念在理解上存在不确定的因素,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意图。就前者而言, 译者源语和目标语的水平、语言风格、所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甚至是受教育的背景都可能使译者对原文中的一些概念在理解上产生偏颇。就后者而言, 译者的价值取向以及对翻译目的的强调都可以影响翻译。极端的情况是译者操纵译本为一定的社会政治目的服务。因此, 翻译研究中对译文的评判不再产生简单和客观的结果, 相反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被凸显出来, 对译文的评

判也充满了话语层面的斗争,体现出各种意识形态力量的角逐。

其次,从话语研究的理论思想出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被进一步认识。译者不再被认为是一个介于两种语言之间的一个中立的、科学客观的转码器,而是一个有思想、有自身价值取向和翻译意图的社会人。随着后现代主义关于话语的认识日益为学者所接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也越来越受到翻译研究学者的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性、知识上的创造性以及他的社会参与性越来越得到认可。正如提莫志克和根茨勒(Tymoczko & Gentzler, 2007: xxx)所指出的,对于源文中哪些部分需要在译文中进行调换,哪些部分必须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不断地作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对源文本来说是一种有倾向的再现。这种有倾向的再现不应被认为是缺陷和不足,或被认为不应存在于翻译之中。这是翻译本身所无法回避和摆脱的问题,无论是否明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已清楚地将翻译从中立的地位解放出来,赋予了它有立场、有目的的特征。

再次,从话语研究的理论思想出发,翻译过程可以被认为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是译者参与的社会实践。作为一个过程,翻译“涉及到语篇的产出者与语篇的接受者之间意义的协调”是“译者作出决定的各种程序”(Hatim & Mason, 1990: 4)。从后现代主义阐释学派来看,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一切翻译皆为解释(陈大亮, 2005)。不论是从译者选择的角度定义翻译过程还是从翻译皆为解释的角度定义翻译,都表明翻译过程不是一个静止和确定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和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基于此认识,田海龙(2017)将翻译过程看作是译者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社会实践,是译者通过自己的翻译活动将某些结构性的可能因素变成具体的社会事件活动。译者的身份就如同社会活动的参与者。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如政治家)通过自己的政治话语(如演讲)来参与社会实践,或建构自己的身份,或再现已发生的事件。译者也是通过自己的翻译话语(如译文)来参与社会实践,在译文中通过选择的特定文体构建自己的身份,通过选择

的特定词汇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体现话语的意识形态意义。

基于话语研究的理论思想重新认识译文、译者和翻译过程,对于丰富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十分必要。这不仅可以使研究者摆脱忠实和灵活二元对立的困境,还可以使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在理论上寻求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实践上更加推崇取决于语境的、具有个性化的翻译策略。

四、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新范式

中央文献英译的重要不仅表明它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如可以向西方介绍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增强外界对中国发展的理解,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认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黄友义、黄长奇、丁洁, 2014),同时也表明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领域。就中央文献翻译研究而言,有两种观点受到关注。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文献翻译应该首先遵循忠实和准确的原则。例如,王弄笙(2004)曾强调中央文献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均有准确的定义,译文必须确切无误地反映原文。不能偏离原意,更不能曲解原意。”甚至有学者(如程镇球, 2003)强调“政治文章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基本政策等,稍一疏忽,后果严重”。与这种观点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文献翻译在忠实原文的同时要尽可能采用译入语的习惯用法灵活翻译文献的内容。例如,孟威(2014)提倡“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要把‘讲故事’和‘讲道理’结合起来……要善用生动地表述,而不是照本宣科、僵化地宣教”。赵祥云(2017)更是明确地表明要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及受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在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实践中,对于忠实与灵活这两个翻译原则而言,并非是以舍弃其中任何一个作为代价来坚持另一个。而更趋于一致的观点是将中央文献英译的准确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结合是一种有侧重的结合。参考程镇球(2003)和王弄笙(2004)的观点,或许可以认为20世纪初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更注重对原文的忠实,而近年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则更多地倾向于在翻译中采取一些灵活的翻译策略。例如,赵祥云(2017)通过

考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发现翻译策略上体现出“尽量用目的语读者愿意听、听得进的表达形式来讲好中国故事”的特征。作者还通过引用习近平(2014:162)关于“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论述说明总书记的讲话对中央文献翻译的启迪意义在于“为了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翻译工作者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采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赵祥云,2017)。

与讨论中央文献英译中的忠实与灵活孰轻孰重不同,从话语研究的理论思想出发研究中央文献英译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可以把翻译实践看成是一种社会实践。所谓社会实践,是一个多种成分相互作用的社会活动,包括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身份、文化价值、意识以及话语。这些成分彼此不同,但又不是决然分开,它们彼此相互联系,在不失去自身的同时将其他成分内化于自身(Fairclough,2012:187)。在话语研究领域学者关注的是社会实践中的话语与其他成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具体来讲就是研究话语是如何产生、如何传播以及如何被接受这样的—个话语实践。将话语研究的这些观点投射到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上可以对翻译研究产生—个新的认识,可以认为对翻译的研究即是研究译文如何产生、如何被传播和如何被接受这样的翻译实践。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考察译文如何产生可以考察译本与源文本的互文、互语关系,考察译本如何传播可以考察译者权威、渠道主流、覆盖面广等问题,考察译本如何被接受可以考察受众的语境模式,即大众认知译本内容方式(田海龙,2017)。通过这样对翻译实践的研究可以探索社会结构因素如何通过译者的翻译导致具体的社会活动,进而更深刻地认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通过翻译所实现的社会价值。

在中央文献英译中注重探索译者的翻译实践,讨论译文如何在与原文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讨论译文如何通过不同分量和权重的渠

道和媒介来实现传播,讨论如何通过观察读者的语境模式来研究译文被接受和认可,实际上是摆脱了忠实和灵活之间的困境,用—种新的研究范式来看待中央文献英译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范式更多地体现出话语研究的学术思想,如译文是—个互文和互语过程的产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因而翻译过程也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更多地依赖翻译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也更多地依赖译者(机构的或者个人的)自身的能力与素质,因而使中央文献英译更多地采用取决于语境的、具有个性化的翻译策略。

五、基于超学科的中央文献英译研究

赵祥云(2017)在考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的翻译时发现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这种异化方法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这种归化方法在中央文献英译中都有运用,并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文化自觉几个方面为这样的翻译策略提供学理支撑。这项研究提出在中央文献翻译中要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和受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这样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在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中便发挥了作用。然而,尽管对中央文献英译中的灵活性给予重视,这样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还没有摆脱在忠实与灵活之间摇摆的格局,还没有把中央文献翻译与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从话语研究的理论思想中汲取营养可以使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开拓出—种新的研究范式,不再纠缠于忠实与灵活孰重孰轻的争辩,不再用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讨论哪一种翻译方法更忠实原文,哪一种方法属于灵活表达,不再讨论哪一种翻译方法正确,哪一种翻译方法不正确,也不再使译本成为译者的某种遗憾。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基于对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超学科思考。

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的概念源自费尔克劳对跨学科概念的分析。他认为,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不寻求改变其中任何一个学科中的理论或框架,只是将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到一个研究之中。与跨学科的概念不同,超学科的概念注重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并通过这种对话使两个学科中的理论框架彼此

将对方的逻辑和原理内化吸收,以形成自身发展的资源(Chiapello & Fairclough, 2012:279)。可见,超学科的研究不是导致一个学科被另一个学科吞噬,也不是改造另一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从另一个学科汲取营养,以丰富、发展自身的理论。

基于费尔克劳关于超学科的论述,从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角度思考可以认为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可以从话语研究中吸取一些有用的概念、理念和框架。就概念和理念而言,话语研究中的一些概念,如权力关系、机构话语、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语言选择等,一些理念,如意义形成的动态特征,都可以在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中作为研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例如,朵宸颀(2014)在中央文献英译研究中考察意识形态与中央文献英译的密切关系,认为意识形态对文本翻译起着干预和影响的作用,提出译者在遵循自身所处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同时需具备跨文化认知能力,对源语文本中语言和论域等相关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翻译策略。在本专栏中尹佳(2017)从译者对原文意识形态的认知与解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意义商讨与选择以及译者在译文中运用的话语建构策略三个方面讨论译者在中央文献英译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在一个方面体现出翻译是一个动态过程的特征。

就分析框架而言,田海龙(2017)提出的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分析框架以及再情景化分析框架(田海龙,2016b)都可以在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中得到应用。例如,在本专栏中陈勇(2017)运用再情景化的分析框架对2017年政

府工作报告的翻译进行研究,发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并不体现在对原文文本的忠实上面,而是体现在原文文本所在的语境上面。译者发挥了一定的主体性,对原文进行了适度的改写,将原文演讲的语境移植到新的语境,让目的语读者能像源语的交际参与者那样感受到演讲的氛围,达到等效(陈勇,2017)。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不仅表明译者放弃文字上的等值来实现语境上的等效,进而更忠实地体现原文的语境,而且体现出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范式,更多地考察中央文献翻译的过程和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不是局限于某些翻译技巧的优劣。

六、结语

超学科的研究视角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不同,其最明显的特征是通过学科之间的对话和相互汲取营养形成可以推动自身发展的新的理论或范式。在话语研究与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对话中,后者可以从前者汲取营养,发展出新的研究范式,反之亦然。只是篇幅所限,同时也是由于研究目的所定,本文重点论述了话语研究可以为中央文献英译研究提供的一些理论思想以及中央文献英译研究从这一对话中可以引发的新的研究范式。从文中的讨论来看,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可以为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在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开启一个新的路径,为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治国理政的有效方式和经验在翻译领域开启新的思考。当然这个新的研究范式目前还只是一个理论层面的思考,仍有待于在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实践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 [1] Chiapello, E. & N. Fairclough. 2010. Understanding the New Management Ideology: A Transdisciplinary Contribution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New Sociology of Capitalism[A]. In N. Fairclough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C]. London: Pearson.
- [2] Fairclough, N. 2012. The Discourse of New Labou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 In Tian Hailong & Zhao Peng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3]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4] Foucault, M. 1984. The Order of Discourse[A]. In M. Shapiro (ed.) *Language and Politics*[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5] Hatim, B. & I. Mason. 1990.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 London: Longman.
- [6] Lefevere, A. 2004.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7] Tymoczko, M. & E. Gentzler. 2007. *Translation and Power*[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8] 陈大亮. 2005. 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J]. 中国翻译, (2): 3-9.
- [9] 陈勇. 2017. 再情景化与政府工作报告英译研究[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5): 8-14.
- [10] 程镇球. 2003. 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J]. 中国翻译, (3): 18-22.
- [11] 朵宸颀. 2014.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影响[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5): 556-560.
- [12] 高玉. 2009. “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3] 黄友义, 黄长奇, 丁洁. 2014. 重视党政文献对外翻译,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J]. 中国翻译, (3): 5-7.
- [14] 贾毓玲. 2011. 对中央文献翻译的几点思考[J]. 中国翻译, (1): 78-81.
- [15] 克里斯蒂娃. 2016. 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M]. 祝克懿, 黄蓓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6] 刘亚猛. 2008. 西方修辞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7] 孟威. 2014. 构建全球视野下中国话语体系[N]. 光明日报, 9-24 (16).
- [18] 田海龙. 2009. 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9] 田海龙. 2016a. 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从批评话语分析到批评话语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6): 3-9.
- [20] 田海龙. 2016b. 跨文化交际的话语解读——再情景化模式[J]. 福州大学学报, (2): 50-60.
- [21] 田海龙. 2017. 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思考和方法探索[J]. 外语研究, (3): 60-64, 71.
- [22] 王弄笙. 2004. 十六大报告汉英翻译的几点思考[J]. 中国翻译, (1): 56-59.
- [23] 习近平. 20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 [24] 许钧. 2003. 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 外语教学与研究, (4): 290-295.
- [25] 杨建华. 2009. 西方译学理论辑要[C].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 [26] 尹佳. 2017. 解读、商讨与建构——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能动作用[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5): 15-20.
- [27] 赵祥云. 2017. 新形势下的中央文献翻译策略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3): 89-93.

出版信息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发起出版《南开话语研究》系列丛书（总主编：田海龙、丁建新）。该丛书旨在探索话语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特别是认识话语在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丛书提倡对话语的跨学科研究，重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出版用中文或英文撰写的专著和主题文集，也出版有助于话语研究的读本。

目前已出版 11 部著作：《批评性语篇分析：经典阅读》（田海龙、赵芃，2012）《当代中国身份重建中的语言运用》（田海龙、曹青等，2012）《边缘话语分析》（丁建新、沈文静，2013）《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形象：英国电视对华报道话语分析》（曹青，2013）《批评话语分析：阐释、思考、应用》（田海龙，2014）《学术建议中的身份建构》（任育新，2014）《中国社区调解的权力与中立：调解策略的话语分析》（邓一恒，2015）《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话语分析》（高一虹、陈向一，2015）《文化转向：体裁分析与话语分析》（丁建新，2015）《语言权势与社会和谐——中国转型期机构话语社会效应研究》（李艺，2016）《“学雷锋活动”历史变迁的话语研究》（赵芃，2017）。

《南开话语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丛书系列，纳入该丛书出版的研究成果可获得出版资助。更多信息可联系丛书总主编田海龙教授，电子邮箱：thailong@163.com。

本期主要学术论文英文题目及摘要

Discourse-studies' Paradigm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Literature: A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IAN Hai-long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literature into the English language generally requires a principle of loyalty to the original work, though flexibility strategies are applied as well. This paper, however, does not discuss this loyalty-flexibility dilemma, but propos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literature from a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literature can draw on some of the concepts, principles and frameworks in discourse studies and develops a discourse studies paradigm of its own.

Key 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discourse studies; new paradigm; transdisciplinarity

A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and Recontextualization

CHEN Yong

Abstract: Translation not only transfers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but also transfers one text from its original context to a new contex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context on the new textual meaning,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an analytical model of translation recontextualization. This model is applied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in 2017 to outline how the translator manages to exercise his subjectivity to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ext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Key words: *The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English translation; recontextualization; context

Interpretation, Negotia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YIN Ji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relevant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C-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Based on CDA's conceptualization of 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might be put to use, i.e.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ideology embodied in the source text, the negotiation and choosing of meaning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n the target text.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realized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rce text and in the expressing of the target text, but also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 of the source text in the target text.

Key words: CD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On the Manifestations of Semantic Blocking at Three Levels of the Composition of English Lexeme

SHUANG Wen-ting, YANG Ling

Abstract: The composition of an English lexeme can be observed from macro, mes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The study of English semantic blocking within the system of lexeme composition facilitates the observation of its various manifestations and consequences. From th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